

第八章

人言可畏





最後的絕唱——《新女性》

一九三四年底，吳永剛著手剪輯《神女》底片時，阮玲玉已在《新女性》影片中拍攝內景。

《新女性》是阮玲玉晚期，即成熟時期的表演藝術代表作。在這部影片中，她的表演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銀幕上的韋明（《新女性》中的女主角）與生活中的阮玲玉已疊印在一起、融化在一起。她不是在表演角色，她是在用自己的血和淚，用自己的心靈，凝鑄成一個藝術形象。

在上個世紀三〇年代，婦女要在社會上求獨立求生存，常常會處在黑暗勢力的包圍之中。特別是一名電影女明星，這種黑暗勢力幾乎會從四面八方襲來。阮玲玉之自殺，絕非孤立的事件。在她自殺的時候，前有艾霞的自殺，後有英茵的服毒（她們兩人都是電影女演員，都富有表演才華）。艾霞既是一個有才華的演員，曾參加《春蠶》、《豐收》、《脂粉市場》、《舊恨新仇》等影片的拍攝，又是一個有才華的作家，曾編寫電影劇本《現代一女性》，並親自擔當主演，可以說是一個優秀的文藝工作者。舊上海十里洋場，不停地上演著人吃人的悲劇。艾霞最終在感情上受到了欺騙，外加經濟上的拮据，乃至因抑鬱而自殺。曾有人回憶及當時情況時說：

她自殺之後，黃色報刊把這一悲劇作為「頭條新聞」，極盡其嬉笑怒罵之能事，借此打擊曾經有進步傾向的文藝工作者。同時，他們還要在死者身上大作文章，從死亡人身上榨取最後一筆收入。

這一殘酷的現實，當時就使在聯華任導演的蔡楚生、李萍倩等人觸動很深。他們既是艾霞生前好友，更以艾霞的一生為原型，由孫師毅執筆，寫成了《新女性》一片的電影劇本。還由蔡楚生任該片導演，聶耳負責作曲，並創作出「新女性歌」，由阮玲玉擔任女主角韋明。此時，蔡楚生已是聯華很有才華的青年導演了，他在前不久所編導的《都會的早晨》（一九三三年）、《漁光曲》

(一九三四年)，都是很有影響的作品。所以，當影片《新女性》開拍之際，人們又知蔡楚生羅致人才頗多，除阮玲玉外，還有王乃東，再加上和孫師毅通力合作，評論界與觀眾一致預料，影片拍成後將震動中國影壇無疑。

一九三四年初冬的一天，聯華公司的一名劇務送來一張紙條：

阮小姐：

請明日到導演辦公室來，有要事相商，切記，切記！

蔡楚生即日

阮玲玉接紙條後有點不知所措，不知道蔡楚生要找她是有什麼事情，她心想：「他找我幹什麼，難道又要我拍那些我不想拍的電影？」蔡楚生是一九三一年加入聯華公司的，而他到聯華公司所導演的第一部電影的調子是低沉的，那時恰逢抗日情緒高漲，因而引來了一些輿論的批評。蔡楚生獨立執導的第二部影片是《粉紅色的夢》，影片中濃重的胭脂氣與國難當頭、人民在痛苦中呻吟的時局尤其顯得格格不入。故此，蔡楚生所導演的這兩部影片不但票房價值不高，而且引起人們的反感。這最初的兩部影片，蔡楚生都曾邀請過阮玲玉主演，只是當阮玲玉接到劇本時，發現劇本裡的角色並不適合自己，同時她對剛剛開始導演生涯的蔡楚生的能力也不是很瞭解，擔心做不好會將自己辛辛苦苦奮鬥而來的名譽毀於一旦，因而兩次婉言拒絕。

兩次導演的失敗，使蔡楚生認識到自己的作品最低限度應做到反映社會基層，盡可能地和普通老百姓接觸。所以，蔡楚生在現實主義創作道路上開始了不倦的探索，普通人民的苦難境遇成了他創作的主題。《都會的早晨》是一九三三年蔡楚生編導的標誌他思想轉變的力作。該片通過對有血緣關係但生長在貧富兩個不同家庭的一對兄弟，所走的絕然不同的人生道路的描寫，透過一系列家庭倫理的衝突，揭示了貧富兩個階級對立的現實。其後的

《漁光曲》是蔡楚生在一九三四年編導的，是他最負盛名的代表作之一。在海邊長大的蔡楚生，在這部片子中通過對他所熟悉的漁民苦難生活和青年知識分子改良中國社會的夢想破滅的描述，用藝術的方式展現了殘酷的社會現實。當該片於一九三四年盛夏季節公映時，數萬觀眾冒著六十年不遇的酷暑去觀看，創下了連映八十四天的空前記錄。

這時候的阮玲玉雖然並不想拍蔡楚生編導的影片，只是生性隨和的她在第二天還是來到蔡楚生的辦公室，蔡楚生熱情地接待了她。「蔡先生，你今天要我來，有什麼事嗎？」阮玲玉實話直問。蔡楚生回：「阮小姐，你大概不會忘記今年年初的艾霞之死吧。」阮玲玉答：「當然知道，別提她，一提起她我就歎息，好端端的一個影壇才女，就這樣死去了。」「阮小姐，你知道嗎？我想把艾霞之死搬上銀幕，女主角艾霞請你扮演。但這只是一廂情願，至於你願不願意，請看完劇本再做定奪。好嗎？」蔡楚生說著把劇本遞了過去。

蔡楚生提起艾霞之死，阮玲玉是知道的。那麼一個有才華的青年演員，竟然就自殺了。在電影圈內艾霞的名氣也是非常大的，她是當時著名的「作家女明星」之一，而在當時能兼作家與女明星這兩個極不平凡的職業於一身的青年女性，實在可謂鳳毛麟角。

生於一九一二年的艾霞，祖籍福建廈門，原名嚴以南。幼時隨經商的父親居於北平，曾就讀於聖心女校。她的學生時代，正值新文化運動的高潮時期，她接受了民主和自由思想的薰陶，並與身為大學生的表哥相戀。然而，她的自由戀愛遭到了封建意識濃厚的父親的堅決反對，她的戀人屈服於壓力退縮了。為了追求她所熱烈嚮往的自由，她毅然與家庭決裂，隻身南下，闖進了上海，改名為艾霞，加入田漢領導的南國劇社，從而開始了她的藝術生涯。

一九三一年，艾霞轉入電影界，入天一公司。第二年左翼電影運

動興起，在左翼文藝工作者大舉進入影壇之時，她被介紹進了明星公司，很快就因主演了影片《舊恨新仇》而嶄露頭角。

一九三三年是艾霞生命中輝煌的一年，她在這一年創刊的《明星日報》第一期上發表了一篇很動感情的短文，題目就叫做〈一九三三年我的希望〉，這篇短文已充分展示了艾霞思想的與眾不同。在文中艾霞述說道：

一九三三年也可以說是我開始新生命的時期……時代的火輪不停地轉著，一切全不息地猛進，一九三二年同一九三三年的電影，是劃分時代的電影，她不是一部分有閒階級的消遣品，這是任何人也不能否認的。我們既然明瞭這一點，我們應當怎樣使她變成有價值有意義，這是從事於電影的人應負的責任，也是整個電影進展的關鍵。

艾霞在這一年中的確成了明星公司新進演員中，最為引人注目的一顆新星。她一連主演了《現代一女性》、《時代兒女》、《豐年》等多部影片，特別是她自編並主演了帶有自傳性質的《現代一女性》，更顯露出她的文學才華。該片描寫了一個以愛情填補空虛的青年女性在革命者的啟發下覺醒的故事，在尚有文盲女影星的時代，能自編劇本的女影星更顯得難能可貴。然而，這樣的一位影壇才女在拍完《現代一女性》後卻不幸再一次陷入了愛情的迷惘之中，她歎息道：

眼淚同微笑，接吻同擁抱，這些都是戀愛的代價。要得這夠味的代價，這夠味的刺激，就得賠上多少的精神，結果是什麼？無聊。

愛情的失落使她頹喪，而周圍黑暗的現實則令她憂傷，她失去了繼續活下去與黑暗抗爭的勇氣，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二日，位年僅二十三歲的女演員服毒自殺了。阮玲玉讀完《新女性》的劇本，心情久久不能平靜，還從來沒有哪一個劇本讓她感受如此巨大的

震動，劇本中的女主角是一位貧困的作家，這與阮玲玉有一定的距離，但她覺得她的心與女主角是完全相通的，她相信自己完全能演好這一角色。她情緒激動地找到蔡楚生，說道：

蔡先生，《新女性》的女主角韋明我演定了。我知道，我並不熟悉女作家的生活，但她心中的苦楚和絕望我是完全體會得到的，請相信我一定能把這個角色演好。

蔡楚生欣然答應了。《新女性》的女主人公韋明就是艾霞的化身，故事結構有艾霞的真實事跡，也有虛構的部分。《新女性》的劇情是這樣的：

韋明為爭婚姻的自主，而離家出走，生一女兒，後被遺棄。她覺悟到女人不應做男人的奴隸，而應過一種有意義的獨立生活，便來到上海，擔任了某女子中學的音樂教員。

校董王博士覬覦韋明的美貌，百般引誘，不能如願，便串通女校長故意辭退韋明，斷絕其生計。韋明業餘致力寫作，將創作的小說送到書店出版，又遭到書店老闆的剝削和黃色報刊的侮辱。

在韋明生活窘迫萬狀之時，她疼愛的女兒又恰好病危。為了搶救愛女性命，在迷惘之中，韋明聽從了一個暗娼鴇母的擺佈，答應去「做一夜的奴隸」，用自己的肉體來換取女兒的救命錢。只是她萬萬沒有料到，要她接待的嫖客正是厚顏無恥的王博士。憤怒之下的韋明，打了王博士一個耳光，奔了回來。失業的痛苦，女兒的垂危，闊少的污辱，同學的誤解，生活的壓力壓得韋明再也直不起腰來，就在她的小說出版的時候她吞下了毒藥。無恥的小報記者幸災樂禍地寫出「獨家消息」，發在當天的晚報上。韋明一息尚存，滿街的報販已在大叫：「快看女作家自殺新聞！」

韋明被送進醫院後，經過搶救，她漸漸地甦醒過來，但仍沒有活下去的勇氣。這時她的朋友趕來，啓發韋明要勇敢地活下去與惡勢力鬥爭，並把晚報上造謠污蔑她的所謂「新聞」給她看了，〈女作家的一頁穢史〉的標題赫然入目，韋明震怒了，並由震怒而覺醒，她用盡全身氣力喊出：「我要活，我要報復！」她要求醫生拯救她，但是為時已晚，因並發心力衰竭，她終於含恨離開了人世。

當一九三四年冬季第一股寒流抵達上海之時，蔡楚生和阮玲玉這兩位著名的電影人，開始了一次在電影史上堪稱典型範例的導演和演員之間的合作關係。《新女性》一片是用一種緊湊的快節奏拍攝完成的。在短短的兩個多月的拍攝週期裡，傾注了劇組成員的大量心血。作為導演的蔡楚生運用其嫺熟的導演技巧，在女主角韋明身上寄予了他對被壓迫被污辱的知識女性的無限同情；對於影片中惡勢力的代表王博士和小報記者齊為德，則給予了有力的鞭撻。

阮玲玉為了演好韋明這一令她心痛的角色，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拍片中去。著名影人鄭君里曾回憶道：

在影片《新女性》裡，我記得十分清楚，她（阮玲玉）對角色的準備工作做得非常嚴肅，一反以前在攝影場內談笑風生的習慣。每個鏡頭的排演和拍攝都準備好充沛飽滿的情緒，一絲不苟，特別當她拍女作家自殺的場面時，每個鏡頭都是真情畢露，聲淚俱下，一場戲拍下來，她的神經似乎被震撼得支持不住。這該算是阮玲玉在表演上最下氣力的一齣戲。可她對於女作家的生活畢竟是有距離的，她雖然決意急起直追，卻不能像對待熟悉的角色那樣駕輕就熟，得心應手。在某些場面中，她的樸實自然的演技反而為刻意求工所替代。可是，這部影片作為阮玲玉接觸新的思想、新的生活的開端，她對舊的憎恨，對新的熱愛的感情，從來沒有表現得這

樣鮮明、強烈而飽滿。

在《新女性》拍攝的同時，由羅明佑編導的《國風》也開拍，羅明佑點名要阮玲玉在《國風》中擔任主角，阮玲玉便同時進行兩部電影的拍攝工作。黎莉莉在《國風》中與阮玲玉飾演一對姐妹，她經常來觀看阮玲玉的《新女性》的拍攝，從中揣摩阮玲玉的表演技巧。儘管黎莉莉與阮玲玉之前已有過幾次合作，對阮玲玉的表演才華曾多次親眼目睹，但阮玲玉《新女性》中服藥自殺的那場情真意切的忘我表演，仍使她感受到了強烈的震撼。後來她問阮玲玉：「妳在表演服安眠藥的剎那間，心中想些什麼？」阮玲玉略想了一下，答道：「很不幸，我也有相似的遭遇，只是我沒有死成，我在演這場戲時，重新體驗了我自殺的心情。在自殺的剎那間，心情是萬分複雜的，我想擺脫痛苦，可是反而增加了痛苦，有很多人的面孔出現在眼前，其中有你最親愛的人，也有你最憎恨的人，每當一片安眠藥吞下去的時候，都會有一種新的想法湧上心頭。」

對影片《新女性》的拍攝，最滿意的要算是導演蔡楚生了。他曾說過這樣一段話：

在《新女性》的合作過程中，我們在生活中和工作上看到她（阮玲玉）許多好的表現，也從她的片語只言中，或通過劇情的矛盾鬥爭她所表現出來的強烈的感情中，看到她內心在贊成什麼，反對什麼，她在嚮往什麼，又在追求什麼；我們都十分敬重她，也為她在思想上的這種進步而高興；但她終究是一個太溫情，感情太脆弱的人，我們又無時不為她的處境而耽無窮的憂慮。

透過章明的悲慘身世，《新女性》相當生動地揭示了當時社會一些正直的知識女性被壓迫、被污辱的命運，活畫出了當時都市社會現實生活中殘酷的一面。《新女性》中的女主人公章明就讀於

北平某女校。畢業後，與表哥戀愛結合，生了一個女孩子。在遭到封建家庭的反對後，她痛苦離家，毅然來到南方上海。她在上海一個中學任音樂教員，並用業務余時間進行寫作，藉以養活她和女兒。這期間，她與校中董事王博士（王乃東飾）結識，王博士追求未遂，一方面暗示校長（吳茵飾）將韋明開除，又挑撥鼓動記者（顧夢鶴飾）大寫造謠文章，正當韋明心力交瘁時，自己的愛女（由當時的童星陳娟娟飾演）又因病夭折，悲憤之中的韋明只有自殺這一條路可走。韋明在醫院病床上彌留之際，得到好友阿英（由非職業演員殷虛扮演）和余海濤（鄭君里飾）勸解和開導，被重新喚起了新生的勇氣，呼喊出來：「救救我吧，我要活啊！」卻終因心臟衰弱，在不忍瞑目的悲痛情感中逝去。

影片中的韋明並不是真正勇敢的女性，她在要求進步，嚮往光明的同時，有著她心理軟弱的一面；影片中更值得歌頌的女性，是由業餘演員殷虛扮演的阿英。她是一個運動員，「她本身就具有單純樸實的氣質和爽朗豪邁的健康美」，在影片中殷虛以其業餘演員的身分，成功地「創造了一個雄偉、壯實、豪邁、熱情的女工形象」。

導演蔡楚生在這部影片中凝聚了不少的心血，使阮玲玉精湛的表演達到了更新的高度。影片剛投入創作時是一九三四年九月初，導演蔡楚生就召集了該片中主要的演職員並公佈了自己的導演思想。在拍攝影片過程中，他「憚心竭智，罄力以赴，甚至不顧櫛沐，使這位風度翩翩的年輕導演變得蓬首垢面」。為了將影片的思想內涵更好地表現出來，在這部影片中也創造性地運用了一些新的手法，如影片開始不久，在曙色朦朧中，韋明從舞臺中回來遇到李阿英，畫面上李阿英的影子在韋明的面前隨著阿英的前進而逐漸大了起來，甚至大過正常人身一倍；又如韋明昏了過去以後，她清醒過來的時候，先是見到白茫茫的一片，隨後再見到由模糊到清楚的人面和四周的東西。這些導演處理在現在來說甚為一般，可在當時，卻是新穎、寓意深遠的手法。這些新穎、創造

性的導演手法，更烘托出阮玲玉塑造的角色的完整性。

曾與阮玲玉合作過的導演，都能領略到阮玲玉既是一個天才的演員，又是個十分勤奮刻苦的人。她經常在進入攝影場之前，就早已做好了進入角色的準備。在進入攝影場之後，又開始有意識地放鬆一下自己的情緒；或在一邊看看小說、打打毛衣；或和藹可親地和人交談著。在阮玲玉拍攝電影時往往就是這樣，拍攝間隙她織毛線，要拍時，才放下毛線活。但是在拍攝《新女性》時，她卻一反常態，在攝影場裡，阮玲玉靜靜地坐在一個角落，思緒、情感完全沉醉在角色之中，彷彿這世界只有她一人存在。從阮玲玉自己短短的一生中，她深深地體會到韋明這個角色的際遇是多麼可悲；同時，看著韋明在劇中可悲的經歷，阮玲玉自己更加清楚地看到自己悲哀的命運；她在由無奈、悲哀和軟弱組織成的生活中，遇到了張達民、唐季珊這樣的男人的欺騙、壓榨和百般凌辱。有時，她在想戲時，簡直分不清哪些是戲中角色的感情，哪些又是自己在生活中的感受？

在一九三四年歲末，《新女性》的拍攝剛開始的時候，當時年僅二十八歲的青年導演蔡楚生，正嚮往著革命，想離開上海到蘇聯去學習。所以，《新女性》是在短短的兩三個月內拍攝完成的。特別是韋明家裡許多重場戲的拍攝工作，是在一連三個不眠之夜趕拍出來的。其中有一天，阮玲玉共拍攝鏡頭二十五個，而光流淚就有十四次。作為一個柔弱的女子，她需要為此付出多麼大的心力！尤其是韋明服用安眠藥片那一場戲，更加地打動人心。對當時的場面，有一段這樣的描述文字：

拍攝之前，她獨自靜默了一會，就很快進入角色之中，眼淚不斷地流下來，她一邊流淚，一邊服安眠藥片。出現在銀幕上的是她的面部特寫，她臉上沒有多餘的表情，只看到隨著她吞下一片又一片安眠藥處，她的眼神起了錯綜複雜的變化，流露出一個自殺者在這生死關頭的矛盾心情，表現出她

對生的渴望，對死的畏懼，她的憤怒和悲哀；從她眼神的變化中也可以看出是誰殺害了她！她在演這場戲時非常激動，事後還哭了大半天，在場的人也都深為感動，沉浸在這個悲劇之中。

阮玲玉在演這場戲時，完全進入了忘我的境界，內心的極度悲憤，對人生的徹底絕望，與外在的平靜取得相輔相成的效果。豐富的內心活動凝結在心如死灰般的神情中，正所謂燦爛至極歸於平淡。只有她的那雙美麗的眼睛，怔怔地望著人生彼岸，絕望、孤獨、悲哀、憤怒、無告這些極強烈的感情從眼神裡閃過，最後歸復平靜，對人生的依戀就此灰飛煙滅，只剩下虛無和冷漠。那雙充滿感情的眼神，誰看了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

影片中，除服用安眠藥片自殺的一場十分動情的戲外，還有在韋明服用安眠藥片自殺後，被送進醫院病床上的一場戲。阮玲玉也是完全沉浸在角色之中。而作為導演的蔡楚生在這場戲裡，也不是像其他導演那樣拿著話筒，在攝影機旁邊旁觀性地指揮一切，他像阮玲玉一樣地投入了自己的感情，使自己也完全沉浸在角色的情境之中。在阮玲玉躺臥的病床的前後，他輕聲地、深情地頻頻指點著阮玲玉的表演。

這場戲，導演安排的鏡頭變化不大，僅以韋明躺在病床上的正面為總角度，以利盡情地、貫穿地表現她在病床上的情感的變化。當阿英、余海濤（這兩個人物，都是從艾霞生前對她有過一些幫助和進步影響的人們中概括出來的）和韋明的姐姐守在病床邊時，阮玲玉用她那失神且朦朧的眼神，無力地對她們說：「你們救我是什麼意思？難道我的苦吃得還不夠嗎？」傷心中的阿英，此時拿出當日晚報上刊登的攻擊和污蔑韋明的文章，悲憤的韋明看見後又喊出：「我要報復」。余海濤勸說她：「假如你死了，不是一切都完了嗎？」阿英也告訴韋明，她所作的「新女性」歌，已經在教女士們學唱，她們都很喜歡這支歌曲。此時，韋明耳邊響

起了令人振奮的歌聲：

新的女性，
 是生產的女性大眾；
 新的女性，
 是社會的勞工；
 新的女性，
 是建設新社會的前鋒；
 新的女性，
 要和男子們一同；
 翻捲起時代的暴風！
 暴風，我們要將它喚醒民族的迷夢！
 暴風，我們要將它造成女性的光榮！
 不做奴隸，天下為公！
 無分男女，世界大同！
 新的女性，勇敢向前衝！
 新的女性，勇敢向前衝！

聽著聽著，彷彿有一股新生的勇氣和力量注入到韋明心中，掙扎著，她將自己的雙手舉了起來，向前抓去，像一個快要溺死的人，要奮力地抓住些什麼。這一姿勢，強烈地表達了她要活下去的願望，但是因為並發的心臟病而最終不能如願。在《新女性》的嘹亮歌聲中，韋明發出震撼人心的呼聲：「請救救我，我要活！」

她要死了，可她卻明明發出要活的呼聲。影片的最後那一場景，登載著韋明自殺的消息及造謠中傷她的文章的報紙被眾人踩在了腳下，同時，新女性們在歌聲中前進。阮玲玉在這一場戲中，激情滿腔，淚如泉湧，以致攝影機停止轉動時，她還在哭泣，她很難平靜下來，仍然躺在攝影場用以拍攝的床上，隨手用白被單罩住自己的臉。她拿出手帕，摀住嘴，想控制自己的感情，可反而痛哭出聲……

作為演員，阮玲玉演的既是角色，又是融化了自己在現實生活中的悲憤和痛苦，和對那個殘酷的社會的控訴。一場戲拍攝下來，阮玲玉的身體和神經幾乎要被震撼得支持不住了。攝影組的工作人員、攝影師周達民和照明的工人也像與女主角一樣，沉浸在一種悲憤而不能自拔的氣氛裡，他們默默地、輕輕地安排著最後的結束工作。

導演蔡楚生見阮玲玉依然在床上抽泣著，透過白被單的顫動，他似乎看到了阮玲玉因生活的積怨而引起滿腔悲憤的一顆受傷的心。他想向她走去，腳卻又不由自主地停住了；他有些發愣，眼前的一切都未見到，只是沉醉在自己思考的精神世界裡。過了一會兒，他示意演員湯天繡（飾演韋明的姐姐）等人去勸慰阮玲玉後，自己緩緩地轉身走去，他低下頭，用手偷偷拭去眼中流出的淚水。

阮玲玉在《新女性》中的表演，決不是以自己來代替角色。真正的藝術形象，是只能用表演藝術來創造角色的，而阮玲玉是更多地調用了自己的生活經歷和感受來演繹角色。但如果僅僅如此，阮玲玉是絕對創造不出如此鮮明的藝術形象的，因為藝術的永恆不是在於創造一個生活中個別的人物，而是創造出永恆的藝術化身。阮玲玉在以上的兩大段激情戲中，前者表現出了感情的層次和分寸，隨著安眠藥片一片一片的吞服，臉部感情的變化愈來愈複雜；在後面的一段病床上的戲中，又著力突出了眼神和雙手的表現力，使人驚歎阮玲玉既有動情、動心的表演，又有高度的表現技巧。

阮玲玉確實很能掌握默片電影表演藝術的特徵。她不僅用眼神、手勢，也用自己整個肢體的靈活來塑造角色。在影片的開始，她買了一個不倒的娃娃（給女兒買的玩具）興沖沖坐電車回家，在車中見到余海濤和同學，她左右顧盼，談笑風生，下車後，雖僅僅是一個側面、背影，但在這一組動態的造型中，她的形象是活躍的、優美的，把女主人公的輕快、幸福的生活感情推到頂點，

先是大起，而後又是大落，在全片中，產生了很強烈的跌宕，使韋明整個銀幕形象的心理色彩既濃厚又富內涵，既感人肺腑又耐人尋味。

阮玲玉表演藝術的精髓，還在於她作為一個藝術家的心靈。自然，阮玲玉創造的韋明，比起她塑造其他角色，她的心靈更貼近角色，自幼備嘗人間艱辛的阮玲玉，成年後，在感情上又飽受疾風暴雨的摧殘，然而她始終保持有一顆善良、單純而美好向上的赤子之心。光輝的藝術，來源於藝術家在生活中對美好的嚮往和追求的心靈。一個心靈醜惡的人，又怎能產生出美好的藝術呢？無論在生活中還是在攝影場上，阮玲玉都始終純真得像一個小孩子，保持了她那一顆赤子之心。

阮玲玉平時是一個和顏悅色，甚至還是一個愛開玩笑，也很幽默的人。她那全身白捲毛、鼻短眼大的愛犬白麗，阮玲玉每每出遊必定攜帶，對它呵護備至，到攝影場拍戲時，阮玲玉的娘姨膝蓋上便成為白麗的暫時的小窩。有時在家中，阮玲玉和小玉還同白麗一起玩樂，從地上到床上，又從床上起身追捕，她像一個小孩子一樣，對一件簡單的事情歡欣不已。

阮玲玉待母很是孝順，特意買來電氣按摩器為母親按摩背、腰。阮玲玉每次為母親按摩時，即使自己的手和腰都酸了也不願停止。養女小玉見母親如此孝順外婆，便也學著使用按摩器為阮玲玉按摩。阮玲玉對這個養女小玉也極是疼愛，每天都要自己為小玉梳頭，教她寫字，陪著她做功課，有時還伏在床頭櫃邊為小玉抹蔻丹。

其實阮玲玉的家庭組合，可以說主要是以母女之愛來聯繫著的，她們都具有南國人特有的熱情。阮玲玉對與其合作拍攝數部影片的女演員林楚楚和她的愛子黎鏗最為友善。在生活中，林楚楚也是一個典型的賢妻良母，阮玲玉既從林楚楚對兒子的情感中吸取母愛，又以這種母愛來對待自己尤為疼愛的小黎鏗（這一感情，

她曾移用到了影片《神女》的表演中)。她們倆對小黎鏗經常開起玩笑來，三人會開心地笑成一團。

黎鏗之弟黎錫，他的聰明過人似乎比其兄長還甚，每次阮玲玉抱著他，都愛不釋手，林楚楚說：「妳那麼愛他，就送給妳！」阮玲玉欣喜之餘便要求讓黎錫做她的乾兒子，後來阮玲玉大奠時，黎錫曾如親子似地跪拜於靈前。

平時的阮玲玉有時也是很幽默的，一九三四年的初春，上海的氣候還是分外寒冷，當時的電影公司缺乏較好的保暖設備，但是拍攝影片又不能因此耽擱，有時甚至工作至深夜。尤其是阮玲玉扮演的韋明，因為拍攝的需要她還穿著薄綢單衫，其中有一場戲是要求阮玲玉暈倒在冰地上。當拍完了這個鏡頭後，有人問她：「冷吧？」阮玲玉微笑著回答：「不冷，很溫暖」，隨即便向問話的人開起了玩笑：「不信你可以試試。」

不得不承認阮玲玉在《新女性》的拍攝工作中，是嚴肅、一絲不苟的。有一場戲需要韋明從二樓的扶梯滾到樓下，導演蔡楚生擔心在緊張的拍攝工作中連犯胃病的阮玲玉纖弱的身體，打算將這個鏡頭用遠景處理，另外找一個身材和她差不多的人來代替阮玲玉的失足摔倒。阮玲玉堅決不同意，認為這樣會減弱了人物情感的連續性和完整性，表示願意親自表演，並將遠景改拍成中景。這個鏡頭拍攝完成後，阮玲玉的膝蓋也磨破了。因為阮玲玉的敬業，即使是銀幕上短短幾秒鐘的鏡頭，她也要求自己認真對待。現在，從《新女性》的完成片看來，阮玲玉從樓上滑下來的鏡頭，也很好地體現了韋明那種遭遇不幸的悲苦心情，這恰恰是構成了這一藝術形象的一個真實環節。作為一個藝術家，阮玲玉對自己的藝術創造，是要求非常嚴格的。

在阮玲玉的藝術事業不斷發展之際，她的感情生活幾乎一直都存在著難言的苦惱。只是每當她在攝影場水銀燈下一站，然有時演的是悲苦戲，而在她內心卻有著按捺不住的工作熱情。這是使她

陶醉的事，也是她生活中最大的精神支柱。從拍攝《三個摩登女性》後，阮玲玉感到聯華的一些同事中，產生了一些與市俗不同的新東西，這些新的、向上的東西，是如此地吸引著阮玲玉。她知道身邊的同事，如導演蔡楚生，這幾年來，他常參加進步的活動，與黃子布（夏衍）、陳瑜（田漢）、洪深、鄭正秋、聶耳等人組織了一個中國電影文化協會，在《晨報》副刊和《影迷週報》等報章雜誌上，號召廣大電影工作者團結起來，「認清過去的錯誤」，「探討未來的光明」，開展「電影文化的向前運動」。同時，蔡楚生也是一個很有前途的藝術家，繼導演《都會的早晨》之後，又拍攝了像《漁光曲》這樣具有較高水平的影片。特別在《新女性》的合作中，阮玲玉親眼目睹了蔡楚生這個在電影藝術上有遠見卓識，又極富正義感的人的工作激情。這一切，在阮玲玉內心中激起了陣陣美好的浪花。

與此同時，蔡楚生在拍攝《新女性》時，既紀念著艾霞，又十分理解、同情幾乎與艾霞遭遇同樣悲苦命運的阮玲玉。他既驚異於阮玲玉表演韋明一角的成功，又從她表演時的眼淚中，領悟到阮玲玉陷於感情生活的漩渦裡而不能自拔。他感到阮玲玉在演繹的同時似乎心裡有許多話要說，而他自己也同樣有很多話要講，但是最終他們選擇的是相對默然。他們兩人在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和共同的藝術創造中，彼此間不由自主地萌生著感情。但現實環境又是不可能、不允許的，他們只有將各自的感情隱藏在內心之中，抑制在內心之中。

阮玲玉死後，蔡楚生凝視著她的遺體，更有著不可對人言的深沉的隱痛，他暗自請求吳永剛在為阮玲玉守靈時，剪下她的青絲一縷留作紀念，並囑吳嚴守秘密。長期以來，吳永剛果守口如瓶，從不告人。後來在吳老晚年，覺這事早已事過境遷，才向外人洩露了此段衷情。

《新女性》的拍攝始於一九三四年底，完成於一九三五年。在那年除夕的前夜，《新女性》首映於富麗堂皇的金城大戲院，蔡楚

生驚喜於阮玲玉的表演才華，在首映式上，向觀眾隆重地介紹了阮玲玉。

那天季節雖是冬天，可氣候倒很像春天般溫和。戲院內坐滿了懷著欣喜之情等待著盼望已久的《新女性》演出的觀眾。經過一次又一次的鼓掌催促之後，潘氏管絃樂隊開始演奏了。阮玲玉和聯華聲樂團，在聶耳先生的率領下，合唱「新女性歌」。阮玲玉站在最上一排的中間。他們身著當時流行的青布服裝，是以新女性的氣魄，唱出雄壯、清脆的歌聲。歌聲隱沒後，導演蔡楚生謙和地出現在觀眾面前，他身穿西裝，外罩了一件大衣，說著一口流利的國語，除向觀眾致謝外，還主要介紹了該片的女主角阮玲玉女士。

阮玲玉欣喜異常，興致盎然地穿上了她平時喜穿的米黃色花旗袍，戴著她心愛的長耳環，珊珊而來，輕盈優美，婀娜多姿。與剛才著布衫唱歌時前後幾乎判若兩人。在全場靜了五分鐘後，《新女性》開始放映。公演後，許多報刊和觀眾都對阮玲玉的新成就，作出了熱情的評價：「阮玲玉演的那一場含淚出賣自己的戲，是不能再逼真了。觀眾們盡在傷感地流淚，啊，阮玲玉的魔力！」「在多得數不清的從業人員中間，比較成功的女星中只有阮玲玉一個。」

此時，阮玲玉的藝術事業，正在一步步向新的高峰攀登，她已經深深紮在了千萬觀眾的心中。

《新女性》這部影片編劇編得好，導演導得好，演員演得更好。正因為這部影片刺到了當時社會某些人的痛處，所以在影片公映之後，廣大觀眾一片叫好，爭相觀看，而當局和「軟性電影」的主將們卻對它恨之入骨，準備將《新女性》及其主要創作人員置之死地而後快。

這是阮玲玉萬萬沒有想到的，《新女性》首映之日，在她面前不全是讚揚和鮮花，還有一把把殺人不見血的「軟刀子」正向她這

樣一個弱女子襲來，一時間，上海灘因此而起軒然大波。在《新女性》首映之日，除上海灘的各界進步人士來觀看影片外，還有一批無孔不入的黃色報刊記者。他們開始進場時，也像往常一樣隨便，當他們看完影片時，竟然一個個像凶神似地臉色鐵青，怒冲冲地離去。

三〇年代初就有因影片內容而引起抗議的多起事件。在《飛花村》（一九三四年，編導：蔡楚生，導演：鄭應時，主要演員：胡萍、高占非）中，因揭露了當時的某鐵路職員販毒的事件和拐逃婦女的黑幕，而遭到鐵路職工會的反對；接著《新女性》裡描寫了一個新聞記者的無恥行為而遭到記者公會的抗議。曾有人在當時的報章雜誌上發表評論：「事實上，影片裡不能沒有惡人的描寫，而被描寫的惡人總不能沒有職業，因而對這一類描寫的文藝作品加以反對和抗議，不免是一種錯誤，難道在生活中，沒有這一類的事情發生麼？」如此所述，電影《新女性》的拍攝，本身就是對當時社會現實的抗議。影片是借當時自殺的電影演員艾霞的生平為影子而創作的。艾霞，這樣一個思想較為進步的女性知識分子自殺是很令人痛惜的。但令人憤怒的是，對於這樣一個有才華的優秀女性的自殺，當時上海的許多報刊輿論不僅沒有最基本的同情，還在報刊上造謠生事，平添許多不實的材料來侮辱死者。

當時，有《時報》記者名為滕樹谷，用剛購置的最新式的套色輪轉機印刷報紙，每天以徑寸大的紅字為標題，詳細地報導全運會新聞，以此招徠讀者。全運會過後，他採訪時黔驢計窮，繼續以「創造」莫須有的事情，來維持發行量。只是事情雖經他說得有聲有色，有根有據，且仍以徑寸的紅字為標題，可是經過有心讀者仔細查核，才發現事實全是虛構。虛報不實的所謂「社會新聞」，《時報》事實上是其開端。當時，滕樹谷已成為上海十里洋場舞榭之中最為活躍的人物，見了演員總是開玩笑、「吃豆腐」。《新女性》的導演蔡楚生鄙視其為人，在與孫師毅編導《新女性》中記者齊為德一角色時，將這個記者角色設計為反面角色。

而如滕樹谷之流，並不從中吸取教訓，在他們看過影片後，「聽說當晚他們走出金城大戲院後，就在旅館裡開了三個房間，糾集了許多黃色報刊的記者，大寫誹謗文章，盡量施展他們的『才能』，捏造些最下流的謠言來攻擊《新女性》的編導和主要演員，揚言要把某某等罵出上海去」。

他們連夜書寫攻擊文章，還向聯華影業公司提出了三點所謂的「最後通牒」：

- 一、登報向全國新聞記者道歉。
- 二、保證以後不能再有同樣事件發生。
- 三、將《新女性》影片內有意盡情侮辱新聞記者部分截去。

那些小報記者們更是揚言要把蔡楚生、孫師毅「罵出上海」，被堅持立場的孫師毅、蔡楚生等人旗幟鮮明地頂了回去，並嚴詞拒絕記者公會開出的無理條件。記者公會碰了這個釘子後，經過一番緊鑼密鼓的策劃後，便施出絕計：以後關於聯華廣告，請一律拒絕刊登；如有聯華宣傳稿件，從此永不刊載，以示拒不合作。

那些連篇累牘的攻擊文章以及這種以新聞記者高尚名義發出的通牒之類，記者公會的舉動令聯華的決策者深感憂慮，對於電影公司來說，失去報刊的宣傳的結果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情，聯華的決策者只有讓步了，在背著孫師毅、蔡楚生等主要創作人員的情況下，他們請出《新聞報》的汪伯奇、《申報》的馬蔭良從中斡旋，表示將接受記者公會開出的條件，並在各報刊登載如下的道歉廣告：

敝公司《新女性》影片中穿插新聞記者之片斷引起上海市新聞記者公會之不滿後，蒙汪伯奇、馬蔭良先生允為調停，敝公司深為感歉，現將片中欠妥各節剪除，已圓滿解決。隨即又向記者公會發出了正式的道歉函，當時記者公會將該函在各報刊登，全文如下：

敬啓者，敝公司出品《新女性》影片，以中有插入新聞記者片斷，致引起貴會之不滿，敝公司深為抱歉，貴會提出二項辦法，與第一條修剪有關各點及第三條保證以後不再有同樣事件發生，業已在前敝公司復函聲明遵辦外，特此謹致意，致上海市新聞記者公會。

經過如此這般的周折之後，影片《新女性》終於再度公開與觀眾見面了，雖然被迫刪去了部分鏡頭，但影片的內容仍給當時人們以強烈的震撼，當時的一些進步影評給予該片以高度評價，並對某些記者及記者公會的行為予以嚴厲的駁斥。曾如有的影評所言：

《新女性》中表現了某些新聞記者的卑鄙無恥而引起了一個大浪，終於刪剪道歉了事。其實，這種事件是十分可笑的。

無論哪一種職業中，總有不良分子存在，只要稍有頭腦的人，總會知道是特殊的。藝術品暴露某種職業中的敗類決不會使人懷疑整個干某種職業的人，假使表現了一個敗類，就算侮辱全體，那麼以後的電影中就不能再有壞人出現，……天下之大真無奇不有，無理取鬧之人到處即是，我們自然更不能「無則加勉，有則改之」這種老話來要求他們，但是我們至少希望他們不要失去理性，……這樣不但是中國電影界之幸，也是新聞界本身之幸，嚴格地檢查自己的隊伍，把這樣的敗類暴露和清除。

影評家和觀眾對主演該片的阮玲玉在片中的表演也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新聞報》的影評是這樣說的：

至於演員技巧的評價，我可以說，都是很高的。阮玲玉的一場含淚出賣自己的戲，是不能再逼真了。觀眾們盡在傷感地流淚，啊，阮玲玉的魔力！

那些小報記者們對如此結果當然不滿意，既沒能將《新女性》打

入冷宮，更未能將蔡楚生和孫師毅「罵」出上海，對此，他們心裡十分惱火。幾天後，他們再次聚集在一起，商量進一步進攻的策略。所謂的「柿子專撿軟的捏」，這就是他們想出一個絕招，他們把矛頭指向柔弱女子阮玲玉。

韋明的扮演者阮玲玉，在《新女性》裡，她們是合二為一的。在韋明的身上，流動著的是阮玲玉的全部思想感情；在阮玲玉的身上，也傾注了韋明的愛、憎以及對生活的希望與無奈的複雜心緒。阮玲玉對某些記者的種種卑劣手段，是有一定思想準備的，是決心與之抗爭的。只是，善良如她哪裡能夠想到，這些上海灘上的小報記者，什麼卑劣的手段都使得出來，無中生有的這些小報記者，炮製了不少所謂的「桃色新聞」，以圖「報復」。

悲憤之中的阮玲玉終於「如願」地「消失」了，在遺言中，她沉痛地寫了四個大字「人言可畏」，以此來告訴人們她說不出，也說不盡的委屈。事發以後魯迅先生即寫了〈論人言可畏〉，在文中先生深刻地指出：

現在的報章之不能像個報章，是真的；評論的不能逞心而談，失了威力，也是真的，明眼人決不會過分的責備新聞記者。但是，新聞的威力其實是並未全盤墜地的，它對甲無損，對乙卻會有傷；對強者它是弱者，但對更弱者它卻還是強者，所以有時雖然吞聲忍氣，有時仍可以耀武揚威。於是阮玲玉之流，就成了發揚餘威的好材料了，因為她頗有名，卻無力。

……不過無拳無勇如阮玲玉，可就正做了吃苦的材料了，她被額外的畫上一臉花，沒法洗刷。叫她奮鬥嗎？她沒有機關報，怎麼奮鬥，有冤無頭，有怨無主，和誰奮鬥呢？我們又可以設身處地地想一想，那麼，大概就又如他的以為「人言可畏」，是真的……

在阮玲玉去世後，這些小報記者為推卸自己的罪責，撰文說阮玲玉自殺是受到其演出的影片《新女性》中「自殺」情節的「啟示」，將他們的態度轉了一百八十度來寫述說他們怎麼同情阮玲玉之死的文章。這些無聊之徒的這些謬論，當時就受到正義者們的駁斥：「《新女性》決不是啟示人自殺的，相反劇作者的創立意圖是反對自殺的；從女工阿英口中就流露出劇作者的本意。反對自殺作為劇的主題，正是劇作者成功的一點。」故《新女性》編導孫師毅憤而寫下挽文：

誰不想活著。說影片教唆人自殺嗎？為什麼許許多多志節有虧，廉恥喪盡，良心抹煞，正義偷藏，反自鳴得意之徒，都尚苟安在人世？我敢說死者，是社會脅迫她致命的，請只看羅羅皂皂，是非倒置，涇渭混淆，黑白不分，因果莫辨，卻號稱輿論的話，居然發賣到靈前。

確實，在阮玲玉演完《新女性》後，上海電影刊物的發行量大大遞增，各大日報也幾乎沒有一家不設電影副刊或不登有關電影的文章的。當時單本的電影刊物也一陣風似地不斷湧現，來作為人們茶餘飯後的消遣。特別是各種小報大都也以刊載電影文章為借口，爭相報導眾多明星們和導演們的私生活，大肆渲染，以迎合一批小市民讀者的口味。阮玲玉之死的間接策劃者《時報》記者滕樹谷、記者崔某及姚某等人，大概是中國第一批狗仔隊了。



最傷最痛是感情

現在發現的一些資料表明阮玲玉的真實死因，一是為情所困、婚姻不幸；二是「著名影星」盛名之下，難堪於「人言可畏」。

阮玲玉死前最後說過：「我有充分的證據，可以證明我無罪，不過報上登的太難聽了。」當時魯迅先生曾化名趙令儀，發表了〈論人言可畏〉一文，深刻地揭示了阮玲玉悲劇的根源所在：新聞之黑暗，司法之流弊，小市民的無聊心理，以及種種阿Q式的優越感，歸根到底那是個「驅人於自殺之途的環境」。

一九三三年四月阮玲玉和張達民訂立了脫離同居關係的約據之後，八月十五日，唐季珊和阮玲玉正式同居了。開始，兩人的確有過一段甜蜜而溫馨的時光。與唐季珊當年將張織雲金屋藏嬌的一個明顯不同是，唐季珊知道拍電影是阮玲玉終身不會放棄的事業。因此，至少在表面上，唐季珊並不阻止阮玲玉繼續拍片。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向敏感的阮玲玉感到唐季珊對自己的熱情在逐漸地減退，特別是他們遷入新開路沁園村的洋房後，唐季珊忙於他的生意和應酬，對阮玲玉也不再像過去那樣體貼入微，甚至有時在碰到不順心的事時，還免不了要對阮玲玉發脾氣。阮玲玉的愛情又一次失敗了。

再度感受到寂寞的阮玲玉只有將她的情感寄託於佛教，然而全心向佛的阮玲玉並沒有逃離厄運，一九三五年初，她的個人生活又掀起波瀾，掀起波瀾的則是張達民和唐季珊。在當阮玲玉的感情受到唐季珊的百般欺凌之時，已經與阮玲玉解除關係的張達民一九三四年底派人在聖誕節後向阮玲玉借用一筆錢。張達民的理由是當年阮玲玉與他訂立的協議，還有將近五個月就要到期了。張達民最近手頭有點緊，希望阮玲玉能將餘下的五百元一次付清。心軟的阮玲玉答應了他的要求，將五百元錢給張達民，並要求來人轉告張達民，自此後阮玲玉與他不存在任何瓜葛了。來人將錢裝進口袋裡後，臉上露出嘲諷的神情說：「阮女士別把話說絕了，本來你在付出這筆錢後，的確與張先生已了無瓜葛。可阮

女士別忘了，你當初搬出來與唐先生同居時，曾將本屬於張先生的衣物及家產也一併搬了過去。所以阮女士帶走的是屬於張先生的財產，我們已經計算過了，那些財產所值不低於兩千元。」

此後的第二天，代表張達民的那人又來了一次，但這次她開出的價錢是四千元，否則不寫文書。阮玲玉稍稍猶豫了一下：「四千元就四千元吧，自己省一點，擺脫張達民比什麼都好」但是唐季珊認為這是訛詐，執意不允許阮玲玉出這筆費用。不久，唐季珊就收到了張達民委託孫弼伍律師寫來的一封信，「指其竊取財物，侵佔衣飾，共值三千餘元，並私刻張氏名義之圖章。」阮玲玉不願打官司，一到法院，法院是不問事實真偽、是非曲直的，未經庭審就會把事情通告周知，那時，以阮玲玉的知名度必然鬧得滿城風雨。然而唐季珊一點也不考慮她心中的憂愁，在他收到訴訟狀後認為所指各點俱非事實，聘請了著名律師熊飛，將一紙訴狀遞到了上海市第一特區地方法院，控告張達民「虛構事實，妨害名譽」。

法院受理了此項訴訟，於是身不由己的阮玲玉被捲入了一場直接導致她毀滅的連環訴訟中。無奈之中，阮玲玉只得委託律師在報上發表聲明：

據當事人阮玲玉女士聲稱，閱報登載唐季珊與張達民訟案內所述各節，完全於事實不符。玲玉雖屬女流，為社會弱者，橫逆之來，原可置諸不論，惟含名譽有關，實難緘忍，不得不縷述身世，借明真相，以求海內人士主持正言而昭是非。查張達民君於數年前雖與玲玉同居，並未締結婚約。張君本無正當職業，又復浪蕩成性，生活所需漸難維繫，在此家庭經濟壓迫下，玲玉無可奈何遂投身影界，月得微資，維持生活，張君則安坐而食如故也。玲玉猶癡望其有成，輾轉為張君代謀瑞安輪船、閩福清縣稅務所等職務，奈張君未忘故習，不克忠於所職，返申後仍逼玲玉，以滿足其無邊之欲為

能事，人生至此，哀痛極矣！緣於二十二年四月間雙方敦請伍律師證明解除雙方關係，玲玉猶不忍見張君飄零，於毫無義務之下，每月以一百元資助之，以兩年為限。此兩年中果能泯祛昨非，力求振作，何嘗不可立身揚名，不意今歲為兩年屆滿之期，而張君並不自新進步，亦未能忘情於玲玉供食之初心，遂不惜捏造偽詞，變更事實、誣陷侮辱，達於極點，以恐嚇手段，以法律為工具，以遂其圖，謀玲玉與萬劫不復之纏而後快。不知天下事是非根據，事實真偽，難逃公評。張君果能覺悟，何不向光明正大途中進展，而必欲與早經脫離同居關係現在以售藝為活之弱者女子，糾纏不休，以使天下女子寒心，而不為碩人道德所不齒。玲玉感於自身法益被侵害，頃已檢齊證據，依法進行，因請貴大律師代登報端，以昭其實。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日對阮玲玉來說是一個黑色的日子。這一天，上海第一特區地方法院開庭審理唐季珊訴張達民「虛構事實，妨害名譽」一案審判在一月十七日進行，由於唐季珊訴訟的證據不足，法庭宣判張達民「虛構事實，妨害名譽」的罪名不能成立，被告張達民無罪。

無奈中，阮玲玉只有接受這個結果。只是，她哪裡知道一場更大的「風暴」即將襲來。在法院判決結束後，唐季珊和阮玲玉在杭州等處旅行散心。沿途中唐季珊對採訪他們的記者訴說了張達民曾經有過的種種劣行。此時被身在上海的張達民聽說了，他心中不服。原本張達民一直想用訴訟來要挾阮玲玉，沒有想到不僅自己先當了被告，而且被唐季珊揭了短，心頭這口惡氣實在難消，但他一時也未想出什麼有效的報復辦法來。雖說最好的辦法莫過於以牙還牙，到法院去告阮玲玉、唐季珊，只是自己不僅沒有什麼證據，而且為了上次官司，錢早已花完了，若再請律師來打官司，恐怕連起訴費用都要付不起了。

後來，張達民在一些記者的教唆和資助下，於一九三五年二月間聘好了律師，竟然在特區第二法院的刑事初級庭和刑事地方庭同時提出訴訟，以刑事罪起訴阮玲玉。以刑事罪起訴阮玲玉，張達民是有著其險惡用心的。當時的民事訴訟，被告均可委託律師代為辦理而不必親自到庭。但刑事訴訟，被告不僅必須到庭，而且還必須站在法官案台右角的一個豎立的齊胸高的方形木桶內，每次庭訊結束，還會來個「庭諭交保」，即被告必須找一家店舖，書面擔保被告下次傳訊時會準時到案。這樣一來，張達民和小報記者們的目的就可以達到了。能打贏這場官司最好不過，打不贏也可確保能徹底羞辱阮玲玉一番。

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五日，阮玲玉第一次接到特區第二法院的傳票。看到有生以來第一回接到法院傳自己出庭的傳票，她心中有說不出的痛苦。阮玲玉知道張達民眼看訛詐不成，利用她害怕訴訟尤其是那種關係到個人隱私的訴訟來要挾她，為的就是讓她在法庭廣眾之下出醜。因此，阮玲玉打定主意，絕不出庭。但是，來自法院的傳票是帶有強制性的。出不出庭，不能由阮玲玉自己說了算。因此，阮玲玉的律師經過商量，以阮玲玉生病為由不能到庭。律師們這個辦法是否可行，還得由法官說了算。

二月二十七日早晨，上海特區第二法院門前出現了一個未曾有過的盛況，法院的大門尚未打開，門前已擁滿了前來旁聽的人。上午九點，法院開庭。阮玲玉並沒有到庭，這也沒引起法官多大的興趣，因為他們已將此案移送到地方法院立案審理，開庭僅二十分鐘就宣告結束。雖然法庭上問答不過十多句，但在第二天的報紙上，記者們都依然寫出了長篇大論的報導，內容是大談阮玲玉與張達民和唐季珊之間的親密關係。

在此後數日內，此類真假相雜、繪聲繪色的以「私生活」、「秘聞」等為題，充塞著「誘姦」、「通姦」等字眼的所謂報導連篇累牘地出現在各報，尤其是一些小報上，極為放肆地對阮玲玉進行誣蔑、攻擊和謾罵，那些被《新女性》一片戳到了痛處的記者們果然大

顯身手了。

面對著「一犬吠聲，百犬吠影」的洶洶之勢，一個弱女子又如何應付呢？儘管所知有限，但是滿城的風言風語足以刺激阮玲玉，冷卻了她在經歷種種後對生活殘留的那一點點熱情。

經過報紙的推波助瀾，電影女明星阮玲玉與兩個男人的故事成了街談巷議的熱點事件，在當時的社會風氣下，這種事毫無疑問地被視為是生活中的最大醜聞。而對名人，尤其是名女人的醜聞天生最感興趣的小市民們，不僅借助報紙將阮玲玉的「艷聞」演繹出多種多樣的版本，而且對即將開庭的張達民訴阮玲玉和唐季珊的案子更是異乎尋常地關注。原本定三月二號開庭審理，也因赴法院一睹為快的人實在太多而推遲進行。三月初，阮玲玉和唐季珊接到了必須在三月九日出庭的傳票。

與此同時，報紙上關於此案的報導，準確地說是以此案為引子的許多不負責任的報導，一時間爆炒開來。阮玲玉雖然對有人不懷好意地來炒這件事情已有心理準備，但怎麼也沒有料到竟會炒到如此程度。最痛苦莫過於阮玲玉了，因為兩個曾經和她如此親密的男人之間的爭鬥而引發的全城的議論紛紛，令她躲避不及，根本無處藏身。

所謂的「新聞」和「輿論」給予阮玲玉的傷害遠遠超過了張達民的忘恩負義和恩將仇報，張達民所表現出來的只是一種無賴手段，雖然也很傷人，尚不至於致命，而報紙對阮玲玉的傷害卻不是這一兩個無賴所能比的，它煽動起了整個社會對阮玲玉的敵視、奚落和嘲笑，使善良而無辜的阮玲玉對「人言可畏」有了切膚之痛。「新聞」和「輿論」終於把阮玲玉逼上了絕境。

蔡楚生準確地記錄了阮玲玉此時的悲涼處境：

雖然正直和同情她的人也尚大有人在——如許多熱愛她的作品和深知她的為人的就都不是那樣看法；但上海之大，她

又何處去告訴，又到何處去鳴冤？這時，她內心不能不直接地痛感到，到處都充滿著對她的鄙視、諷刺，辱罵與斥責，也到處都充滿著「正人君子」的冷笑與魔鬼們凶狠陰毒的眼光……

一向心地善良到懦弱的她，她是那樣的愛惜羽毛，又是那樣的愛強愛好，但是現在她在千萬人的面前，卻成了莫須有的罪人，她再也抬不起頭來了。……她是可恥的蕩婦？是罪不容誅的禍水？……她不能忍受這樣的侮辱，也經不起這種狂風驟雨的襲擊！這種信信的「人言」，其「可畏」終於迫使連一隻螞蟻都不願踩死的她，而於將被所謂的法院傳訊前，竟下了可怕的決心，最後結束了自己寶貴的生命。

的確，絕境中的阮玲玉已沒有多少選擇的餘地，只有兩條路：要麼出庭，受盡屈辱；要麼從這個充滿陰謀和罪惡的世上消失。她想了又想，最後終於選擇了後者，即自我結束生命之路。阮玲玉在愛與痛的邊緣苦苦掙扎，往哪裡走似乎都是絕路。而在絕路中自絕，對於阮玲玉而言，就是在絕路中求生。

自行了斷的阮玲玉並沒有在遺書中道出真相，其實留下「男人可惡」四個字已經足夠。六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在故紙塵堆中鉤沉，細細地品味阮玲玉和她平生遭遇的三個男人。第一個是初戀情人張達民，第二個是衣食情人唐季珊，第三個是知己蔡楚生。三個男人剛好是三種典型，第一個無賴，第二個自私，第三個雖能理解她卻不能真正地愛護她。

她短短的一生，已經依照眾多明星藝員的人生軌跡經歷了三種情感，最先是單純的初戀，撞著誰是誰。出身卑微的阮玲玉，母親是大戶人家的幫傭，她與張家少爺張達民的相愛，有些類似於灰姑娘和王子的故事。可是即使她有灰姑娘的美麗與善良，張達民卻不是救她於水深火熱之中的王子。由於她的演藝天才，自十六歲起命運就將這個美麗女子送上雲端，但同時也埋下將她拋入

地獄的災星——張達民，她先是與張達民同居，不務正業的張達民，嗜賭如命，耗盡她的積蓄，也耗盡她的愛情，阮玲玉曾為此服毒自殺，幸被及時救起。

茶葉大王唐季珊是慕名而來的追星族，他既闊綽浪漫又體面開明，那位扶不起的阿斗張少爺與之對比實在相去甚遠。在脈脈溫情之中他看中的是阮玲玉的名聲和美貌，她成為豪門暗寓裡的一隻金絲鳥。雖與張達民分手早已成必然，但淪為賭棍的張少爺，將良心靈魂顏面尊嚴也早已拋到九霄雲外，他只知道阮玲玉是他的搖錢樹，他的眼裡全都是一張張鈔票，於是他便拿著曾經的「愛情」討價還價起來。演藝事業如日中天的阮玲玉，所拍攝的影片《新女性》使她和導演蔡楚生之間有了逐步的瞭解，萌發了沒有言傳的暗暗的情愫，暗戀是美麗的。

阮玲玉拍完《新女性》最後一個鏡頭那一晚，即將告別這個劇組，表現出難捨難分的依戀之情，當夜已經深時，阮玲玉還在這裡流連徘徊不忍離去。

這天晚上，兩個都有過飄零身世，都靠自強自立來立足於電影界，有著共同藝術志趣和為藝術而獻身的精神，也互相暗暗愛慕的兒女，終於打開心扉，進行了一番知心知意、知冷知熱的深長的交談。交談中除互相傾吐各自能夠領會並不付諸言傳的情愫外，阮玲玉第一次向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坦誠相待的朋友，傾吐了自己的身世，即便在這樣的場合，溫厚善良的阮玲玉也沒有多說張達民和唐季珊的壞話，她傾訴的是自身的不幸與悲哀，這更使蔡楚生感到阮玲玉很有教養，是一個難得的心地善良的女性，因而更加敬重。

可惜，只有那天晚上，他們的心扉開啟了這麼一次，從此以後，那扇大門又重新關閉了，他們各自壓抑了自己內心的熱情，只留下那晚的永世難忘的一瞥。在蔡楚生也離世後，著名作家、影界前輩柯靈先生第一次公開披露：

在《新女性》合作過程中，這兩位彼此傾心相訴的藝術家，各自痛苦地扼殺了燃燒的熱情。阮玲玉力圖改變命運的努力落空了。要不然，這一幕悲劇也許可以避免。

也許是一個「使君有婦」，一個「淑女有夫」的緣故使他們最終放棄了自己心底的感情吧，但這也只是「也許」而已，在這個「也許」後面也許還有更為複雜的心理的、社會的、經濟的種種原因，後人就不能隨意猜測了。一段真正純真、美好的感情就這樣被扼殺了，而這種感情卻正是阮玲玉從少女時期一直期盼的，這才是真正的悲劇。

好女人碰不上好男人，阮玲玉難逃遇人不淑之命。第一個男人無恥無能，本不足道。第二個男人是不被粉飾的商人，他也許從未有過白頭到老的許諾，但他懂遊戲規則，能給的與不能給的從來涇渭分明，赤裸卻沒有欺騙。最後那個，愛她怕是最真心的，只是勇氣欠佳。阮玲玉一生都在尋找一個寧靜舒適的地方，可以容納她那顆美麗而孤獨的心，她有尋找的勇氣，只是她所遇見的男人沒有一個敢承擔那份愛。

生活不如藝術，即使阮玲玉在鮮花盛放的年華猝然凋謝，那些愧於她的男人也不會在細雨霏霏的日子，像電影《生死戀》那樣，坐到網球場去懷念她的美麗與哀愁。儘管她有一張過於成熟的臉，卻沒有相稱的世故，實在難留人間。如果她能活過三十歲，也許就不會有這樣的悲劇了。